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英) Peter Fawcett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英) Peter Fawcett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 - 2006 - 1834

© Peter Fawcett 1997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ose of transl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either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or a license permitting restricted copying issued by the Copyright Licensing Agency (CLA), 90 Tottenham Court Road, London, W1P 9HE. In North America, registered users may contact the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CCC): 222 Rosewood Drive, Danvers MA 01923, USA.

First published by St. Jerome Publishing Ltd.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世界任何地区,以任何文字,作全部和局部之翻印、仿制或转载。

本书由英国圣哲罗姆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影印版。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销售,不得出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 (英)福西特(Fawcett, P.)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1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 - 7 - 5600 - 6191 - 7

I. 翻… II. 福… III. 语言学—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314 号

出版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车云峰

封面设计: 袁璐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12.25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600 - 6191 - 7

定价: 1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专家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东风	王克非	王宏印	毛思慧
文 军	方梦之	申 丹	申雨平
冯庆华	冯志伟	吕 俊	朱志瑜
朱纯深	庄绎传	刘士聪	许 钧
孙艺风	孙致礼	李亚舒	李德凤
李德超	杨自俭	连淑能	汪榕培
张柏然	张美芳	陈宏薇	陈国华
陈德彰	范守义	柯 平	郭建中
黄忠廉	黄振定	辜正坤	程镇球
谢天振	廖七一	谭载喜	潘文国
穆 雷			

外研社翻译研究文库 *

现有书目:

About Translation P. Newmark

《论翻译》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G. Samuelsson-Brown

《译者实用指南》

Can Theory Help Translator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vory Tower and the Wordface A. Chesterman & E. Wagner

《理论对译者有用吗? 象牙塔与语言工作面之间的对话》

Corpora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F. Zanettin et al.

《语料库与译者培养》

Corpus-based Approaches to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S. Granger

《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和翻译研究》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I,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T. Hermans

《跨文化侵越——翻译学研究模式 (II): 历史与意识形态问题》

Electronic Tools for Translators F. Austerlühl

《译者的电子工具》

Intercultural Faultlines: Research Model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x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M. Olohan

《超越文化断裂——翻译学研究模式 (I): 文本与认知的译学研究》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 Pym

《翻译史研究方法》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Second Edition) C. Nord

《翻译的文本分析模式: 理论、方法及教学应用》(第二版)

The Translator's Turn D. Robinson

《译者登场》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 S. Holmes

《译稿杀青! 文学翻译与翻译研究文集》

* 本文库采用开放式结构, 今后还将陆续添加其他有影响的翻译研究著作。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A. Lefevere

《文学翻译: 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D. Robinson

《翻译与帝国: 后殖民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 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 P. Fawcett

《翻译与语言: 语言学理论解读》

Translation and Literary Criticism: Translation as Analysis M. G. Rose

《翻译与文学批评: 翻译作为分析手段》

Translation and Nation: 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

R. Ellis & L. Oakley-Brown

《翻译与民族: 英格兰的文化政治》

Translation and Norms C. Schöffner

《翻译与规范》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R. Álvarez & M. Vidal

《翻译, 权力, 颠覆》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 G. Anderman & M. Rogers

《今日翻译: 趋向与视角》

Unity in Diversity? Current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 Bowker et al.

《多元下的统一? 当代翻译研究潮流》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D. Robinson

《西方翻译理论: 从希罗多德到尼采》

语言学对翻译有什么用*

这是一本值得每一位不太了解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者读的书，也是翻译专业研究生应当仔细阅读的书。

书的作者彼得·福西特(Peter Fawcett) 早年在牛津大学主攻法国文学，获得学士和博士学位后，在法国教了5年英文，之后在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担任法语讲师长达25年，教授本科英法、法英翻译等各种法语相关课程，还教授研究生高级翻译和翻译理论课，现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现代语言学院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他不仅教翻译，而且还从事翻译实践，译过5部不同学科的专著，其中3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研究兴趣广泛，涉及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许多方面，发表了十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包括为莫娜·贝克(Mona Baker 1997)所编的*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写的两个条目“Ideology and Translation”和“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Theory”。本书是他唯一的一部专著。

福西特的母语是英语，他精通法语，懂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俄语，书中这些语言互译的例子比比皆是。可惜他不懂汉语，没有以汉语为例，对中国读者来说，未免有些美中不足。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在这篇“导读”中举了一些英汉、汉英翻译的例子。

这本书是为不太了解语言学的译者和翻译研究者写的，为这样一本书写“导读”，我也假定读者对语言学不太了解。有些地方写得可能过于浅显，敬祈对语言学已有相当了解的读者原谅。

下面分章对本书的内容进行解读与评介。

前 言

福西特在前言中开门见山地说：

本书介绍语言学与翻译理论之间爱恨交加的关系(love-hate relationship)。许多语言学家对翻译理论不感兴趣，一些翻译理论家也日甚一日地宣布语言学拿不出任何东西供翻译学科借鉴。本书作者既不完全赞同对语言学的这种怀疑态度；也不把语言学视为翻译

* 本文承刘润清教授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研究的大救星；而是相信翻译中有许多东西只能通过语言学加以描写和解释。进一步说，译者如果对语言学缺乏基本了解，就等于工匠干活却没有带全工具箱里的工具。

这是福西特作为一名翻译教师、实践者和理论家对语言学与翻译实践乃至翻译研究之间关系的体会和总结。

作为一名做过一些翻译实践并且对翻译理论有一些兴趣的语言学研究者，我的观点与福西特略有不同。在我看来，某些语言学理论，如后期的生成语法，确实对翻译实践和理论没有什么用，因此把语言学当作翻译研究的大救星肯定是错误的。同时，有些著名翻译家似乎并不懂什么语言学，仅凭自身出众的双语素养和悟性，翻译实践也很成功，就像有些人说不出什么语法规则却说得一口漂亮外语一样。对这些人而言，语言学似乎也没有太大用处。可是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语言学远不是可有可无，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对这种转换进行研究，首先要对转换对象、转换结果、转换方法、转换过程等进行描写，没有语言学知识的支持，不知道什么是音位 (phoneme)、形态 (morpheme)、词缀 (affix，包括前缀和后缀等)、词 (包括虚词、实词、名词、谓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等各类词)、形态变化 (inflection，又译为屈折变化)、短语、中心语 (head)、修饰语 (modifier)、限定语 (determiner)、语句 (clause，包括主句、从句)、句子 (sentence，包括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话语 (discourse)、段落、篇章或文本 (text) 等，翻译研究 (这里指对翻译本体的研究，不包括译者研究、译作读者研究等翻译外围研究) 可以说寸步难行。有了这些语言学基础知识还不够。研究音译的不了解音义学和音位学，研究意译的不了解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翻译策略和方法的不了解形态学 (morphology) 和句法学，研究篇章翻译的不了解篇章语言学 (text linguistics) 和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研究翻译标准的不了解文体学、社会语言学和方言学，研究翻译过程的不了解心理语言学，即使发表一些相关言论，这些言论也行之不远，因为肯定都不过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这样看来，语言学对于翻译理论和实践，顶多是个有用无用、用处大小的问题，不存在有害无害的问题。既然无害，福西特所说“爱恨交加”中的“恨”实不知从何而来。

据福西特介绍，受语言学影响的 (linguistically-oriented) 翻译研究主要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因此本书重点介绍这一时期对翻译研究产生影响的语言学。鉴于语言学的影响后来并没有中断，

而且近来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书中对语言学的一些新进展也作了介绍。全书共分 12 章。第 1 章介绍语言学的几个最基本的概念；第 2-5 章介绍与词的翻译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第 6 章介绍超越词的语言单位（特别是句）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第 7-9 章介绍超越句的语言单位的翻译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学问题；第 10 章介绍社会语言学；第 11 章介绍语用学；第 12 章介绍心理语言学。

一 导言

本书的导言写得不算太好。本来，作者应当接着“前言”里提到的语言学与翻译理论爱恨交加这一话题，从宏观上把这一问题阐述清楚，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把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把语言学的发现应用到翻译实践中；另一类是建立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也就是建立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的翻译理论。如果这两方面的问题能阐述清楚，那也很好，可是他也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论点。导言中谈到索绪尔（Saussure 1916/1972）关于语言 / 言语（langue/parole）、能指 / 所指（signifier/signified）¹、排列选择 / 句法组合（paradigmatic/syntagmatic）² 关系的理论，读者期待了解这些基本概念对翻译实践有什么帮助，结果大失所望。

索绪尔的语言指全社会的语言系统，言语指个人的言语行为。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不是言语。受索绪尔的影响，过去百年中，关于语言的理论发展出不少，而关于言语的研究却没有多少进展。可是对于译者来说，他们的工作对象是言语，而不是语言，即使掌握了源语与译语的语言系统，也不能保证能做好翻译工作。因此，对于译者来说，语言 / 言语的区别显得没有什么帮助。

能指与所指是索绪尔用来说明语言符号（linguistic sign）任意性（arbitrariness）的一对术语。索绪尔认为，语言中的每一个词就是一个语言符号，每一个符号由两个成分构成，这两个成分不是名称及其所代表的事物，而是人脑中的某一声音形象（acoustic image，也就是一个词的发音）及与之相连的某一概念（如“树”、“马”等）。索绪尔把声音形象称为能指，把概念称为所指。所谓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是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连接完全是任意的，没有理据的（unmotivated），这就是为

1. 这是 Baskin (1959) 的译名。在 Harris (1983) 译的第二版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中，signifiant 和 signifié 分别被译成 signal 和 signification。

2. 这两个术语通常被译成聚合 / 组合（见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2000）。

什么不同的语言用不同的词表达同一概念。福西特认为,对于译者来说,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观点很成问题。如果能指、所指之间的连接是任意的,翻译就是一项十分简单的工作,只要把源语的能指换成译语的能指就行了,这项工作机器完全可以胜任。不用说,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不仅独立于具体能指之外的概念是否存在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一个词除了其概念意义(denotation)外,往往还有连带意义(connotation)³。这些都是索绪尔没有考虑到的。看来能指/所指的区别对译者也没有多大帮助。

排列选择/句法组合是索绪尔理论中一对十分重要的术语。paradigmatic 是 paradigm (法语 *paradigme*) 的形容词形式,而 paradigm 作为语法学术语,其本义是“词形变化排列表”,例如,英语谓词的各种形式排列在一起,就是一个 paradigm。syntagmatic (法语 *syntagmatique*) 是 syntagm (法语 *syntagme*) 的形容词形式,而 syntagm 的意思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符号组成的句法单位(syntactic unit)”。索绪尔用排列选择/句法组合这一对术语说明,语言符号组成语言单位受到两种关系的制约:排列选择关系决定在一个具体的句法位置上有哪些项目可供选择使用,而句法组合关系则决定两个语言符号以什么形式组合成一个句法单位。本书作者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两种关系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而是笔锋一转,谈起词语搭配问题。当然,词语搭配也涉及排列选择和句法组合这两种关系,但这并不是索绪尔所特别关注的问题。

总之,以上几个语言学术语或基本概念不说还好,说了后,反而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语言学理论对翻译没有什么用处。这种违背作者初衷的效果恐怕不是作者希望看到的。

导言中福西特还提到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由于第 10-11 章专门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这里不加解释。

二 词的构成成分 (Sub-Word Components)

音是词的首要构成成分。所谓音译(transliteration),就是用译语转写源语的发音。怎样在译语中再现源语的声音效果,特别是诗歌和广告里的头韵(alliteration)、半韵(assonance,又称“半谐音”)、尾韵(rhyme)

3. connotation 一般被译成涵义,可是查《现代汉语词典》(2005),涵义同含义,再查含义条,解释是“(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看不出 connotation 的意思。connotation 源自中世纪拉丁语谓词 *connotare*, 其本义是 *con-* “一起,连带” + *notare* “标记”,因此 connotation 的含义应当是“连带意义”。

等，是翻译实践的一个大难题。福西特认为译者需要掌握一些语音学（phonetics）的知识，才能做好音译。严格地说，语音学虽然研究语言的声音，却并不研究上面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属于音韵学（prosody）的范畴。当然，音韵学需要以语音学和音位学（phonology）为基础。译者有了音韵学方面的知识，才能识别特殊的语音效果，才能判断这种效果是作者有意营造的还是自然巧合，才能决定是否有可能在译语中再现这种效果以及怎样再现这种效果（p.11）。

福西特（p.12）介绍了德国学者齐默尔（Zimmer 1981）的一项研究。齐默尔调查了数个世纪的法-德文学翻译中文字游戏（wordplay）的译法，发现译者主要采用3种解决办法：1）改变所使用的语音手段（如用半韵对应头韵）；2）加注释；3）换词（即选择虽与源语词在语义上不太对应但却能取得类似语音效果的译语词替换源语词）。

福西特在本节里还论述了语音转写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形位（morpheme）⁴是语言最小的有意义的形式单位（p.15）。福西特指出，译者有了形位方面的知识，就可以轻松分解和理解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卡罗尔（Lewis Carroll）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造出的那些稀奇古怪的词，例如 bryllig, slithy。

很多时候，形位层次的翻译也是必要的，仿译（calque，也称借译）就是把一个词的两个或多个不同形位分别直接译成译语，例如丢脸译成 lose face。

另一种形位层次的翻译是把源语中的形位译成译语中的词或短语，例如把源语中的复数译成各种、多个之类（p.16），这被称为移级翻译（rank-shifted translation）。翻译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如把源语中的各种、多个之类译成复数。

本章中福西特（pp.17-18）还介绍了怎样在翻译中应用语义学中的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成分分析法也称语义特征分析法，就是把一个词的语义特征分解出来，在翻译中恰当地表达出来，以提高翻译的精确度。

4. morpheme 通常被译成语素，可是研究 morpheme 的学问 morphology 却被译成词法或形态学，彼此缺乏一致性。从词源和语义上看，形态学是正确的，因为希腊语 *morphē* 本身的意思就是“形式，形状”。既然形态学这一译名是正确的，那么其研究对象自然应该是形态。另一方面，morpheme 的定义是最小的“形式单位”（p.15），从这一角度看，把 morpheme 译成形位可能更为恰当，就像 phoneme 现在被译成音位一样。这样一来，morphology 更恰当的译名应当是与音位学对应的形位学。

三 语义学

在语言学的各个分支中，语义学起步比较晚。从索绪尔 (Saussure 1916) 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到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1935) 的《语言论》(*Language*)，再到乔姆斯基 (Chomsky 1957) 的《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 和霍凯特 (Hockett 1958) 的《现代语言学教程》(*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主流语言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避而不谈语义，因为语义被视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很难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幸好并不是所有语言学家都对语义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一些语言学家对语义场 (semantic field) 的研究成果，就值得译者去了解，因为它与确定两种语言之间的对应词直接相关。

语义场的研究始于德国语言学家特里尔 (Trier 1934, 见 Palmer 1981)。根据语义场理论，在一种语言里，所有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如颜色词）构成一个语义场，也就是说，一个语义场被数个意义相近或相关的词所瓜分。语言不同，语义场的构成也不同。有的语言，某一语义场的词多一些，人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伊努伊特人 (Inuit, 过去称为爱斯基摩人) 语言中表示“雪”的语义场；而另一语言的对应语义场，涉及的词会少一些。即使两种语言的相同语义场在近义词或相关词的数目上一样，语义场的分割方式往往也不一样，源语的一个词常要对应译语的几个词，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例如汉语的一个锅字，对应的英语词就有 pot, pan, wok, cauldron 等（见汉英双语版《现代汉语词典》2002），而英语的一个 pot，对应的汉语词包括“锅，罐，瓶，壶，碗”（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2004）、“壶，锅，罐，花盆，碗”（见《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2004）或“罐，壶，咖啡壶，茶壶，钵”（见《英汉大词典》1993）。译者如不明瞭源语和译语在语义场上的差异，在对应词的选择上就会出错。需要指出的是，两种语言的某一语义场即使存在对应程度很高的两个对应词，也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在译文中使用这种对应词，因为译者除了要考虑语义对应外，还要考虑使用频率的对应。有时为了取得后一种对应，译者不得不选用语义对应程度略低一些的对应词 (p.21)。

语义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同义词、多义词 (polysemy)、同形异义词 (homonymy)、反义词等。这方面的知识对于译者来说可能用处有限，可是在同义词基础之上分别出的连带意义 (connotation)，却是译者不得不时刻注意的问题。福西特 (p.23) 举的一个例子是法语词 *brioche*。

brioche 是一种加黄油 (butter) 做成的甜面包, 形状可以是长方形的, 也可以是小圆形的, 属于面包中比较贵的一种。英国人把这个词直接借用过来, 所以这种面包在英语里也叫 *brioche*。可是这同一个词在英语和法语里的连带意义却很不相同。对于那些喜欢 brioche 的英国人 (可惜福西特不在其列) 来说, brioche 只不过是一种美味的面包。而在法国人的脑海里, brioche 却能勾起许多联想, 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王后玛丽 - 安托瓦内特 (Marie-Antoinette) 因为说了句让吃不饱面包的老百姓吃 brioche 的傻话而受到人们的耻笑。我想, 法国人说起 brioche, 大概就像中国人说起粽子、月饼、饺子一样。

据 Osgood 等 (1957) 的研究, 褒义与贬义、主动义与被动义、强义与弱义, 这些都属于词的连带义, 都是译者需要考虑的意义。

四 翻译技法

本章中福西特介绍了 3 个不同国家的学者所归纳出的翻译技法。

俄国翻译理论家雷茨克尔 (Retsker 1974: 9) 区分了源语与译语之间的 3 种对应情况: 1) 对等 (equivalence); 2) 语境对应 (contextual correspondence); 3) 翻译转换 (translational transformation)⁵。“对等”指一对一的对应, 如 *carbon monoxide* 对一氧化碳。“语境对应”指一个对多个的对应, 一个源语词在译文中究竟对应多个对应词中的哪一个 (例如英语的 *pot* 对应汉语的哪个词), 要靠语境决定。“翻译转换”指在缺乏一对一或一对多对应词的情况下, 译者视情况灵活翻译。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在这里便派上了用场。“对等”被认为属于语言范畴, 而其他两种对应则被认为属于言语范畴。译者的灵活性表现在翻译技法的运用上, 包括具体化 (concretization), 即把语义宽泛一些的上位 (hypernymic) 词转换成语义具体一些的下位 (hyponymic) 词, 例如把 *sister* 译成姐姐或妹妹; 逻辑派生 (logical derivation), 即用表示“部分”的词表示“整体”等, 包括各种换喻或转喻, 例如用高手译 *master* 或用 *calligraphy* 译墨宝; 反义翻译 (antonymic translation), 即正话反说, 反话正说, 如不译成 *very big*, 生前译成 *before he died*; 补偿 (compensation), 即当译语缺乏源语的某一语言手段时, 为了充分表达源语的意思, 需要用另一语言手段把缺失的意思补偿出来, 例如英语里没有“你”和“您”的区别,

5. “语境对应”和“翻译转换”被施魏策尔 (Shveitser 1987: 25) 称为类推 (analogy) 和充足 (adequacy), 其实类推和充足并不恰当。

为了表达对称谓对象的礼貌或尊敬,可以采用称呼语 *sir, madam/ma'am* 或谓词时态后移 (backshifting) 等方式加以补偿。

加拿大学者维奈、达贝尔内 (Vinay & Darbelnet 1958) 提出了 7 种翻译技法, 包括借词 (borrowing)、仿译 (calque)、直译 (literal translation)、换位 (transposition, 即用谓词译名词或用副词译谓词等)、调整 (modulation, 即改换表达方式的视点, 例如正话反说)、对等 (équivalence, 即使用译语在同一语境中的对等表达方式, 哪怕这一表达方式在形式上与源语的很不一样)、顺应 (adaptation, 即使用译语中惯常使用的词语, 以使译文顺应译语的语言习惯, 哪怕译语词与源语词在语义上不对应)。

美国学者马隆 (Malone 1988) 则归纳出了 6 种翻译技法, 其中与上面各法不同的有莫名其妙地被统称为“崎岖法” (zigzagging) 的“分化法” (divergence, 指将一个词译成多个词, 如英语的 *he complained* 译成汉语的他抱怨说) 与“合并法” (convergence, 与“分化法”相反)、被统称为“增减法” (recrescence) 的“扩增法” (amplification, 即添加必要的信息) 与“缩减法” (reduction, 即省略不必要的废话) 和被统称为“重装法” (repackaging) 的“膨胀法” (diffusion, 即用多个词表达源语一个词的意思) 与“压缩法” (condensation, 即用一个词表达源语多个词的意思)。据信, 由于翻译中“膨胀法”远比“压缩法”使用得多, 所以译文通常要比原文长一些。

对于这些翻译技法, 人们提出了不少批评, 福西特总结为 5 点 (pp. 50-52), 其中第 5 点最关键, 那就是, 翻译实践家们早就在应用这些技法了, 语言学家只不过给这些技法起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名字 (fancy names) 而已。

面对某些翻译家的鄙夷, 语言学家可以这样回答: 每个人说自己的母语时都在运用母语的语法, 但这不等于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母语的语法反省、归纳、表达出来。语法学家的任务是把这种语法研究出来, 呈献给你。你要是个普通老百姓, 可能会拿起来翻一翻, 然后说, 这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都会, 然后继续保持自己“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的自然状态。你要是一名语言工作者 (language professional), 十有八九会好好读一读, 研究一下里面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弄明白以后, 把它用在自己的工作, 达到“不仅知其然, 而且能解其所以然”。最好的翻译家, 其译语和母语一样好, 假如不了解语言学, 也就像处于自然状态的说母语的人。多数翻译实践者还达不到这一境地, 他们本身还是译语的学习者, 他们掌握

的译语还是一种中间语 (interlanguage)。对于他们来说, 语言学的重要性不亚于英语语法对于成年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

五 对等

研究各种翻译技法和策略的终极目的是取得译文与原文的对等。“对等”这一概念是翻译研究中争论最多的话题, 争论得多, 纸张就费得多, 纸张费得多, 造纸用的木材就需要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福西特 (p.53) 说这一概念 probably cost the lives of more trees than any other in translation studies (在翻译研究领域因这一概念而丧命的树很可能多于因任何其他概念而丧命的树)。

本章着重介绍卡特福德 (Catford) 和奈达 (Nida) 关于对等的理论。

卡特福德区分了“形式对应” (formal correspondence) 与“篇章对等” (textual equivalence): 前者指源语与译语有对应的语法范畴, 如源语介词对应译语介词; 而后者则指在源语和译语之间缺乏形式对应的情况下通过“翻译调整” (translation shift, 即各种翻译技法) 所取得的对等。福西特解释说, “形式对应”是属于“语言”范畴的问题, 而“篇章对等”则是属于“言语”范畴的问题。这恐怕是对索绪尔语言与言语的曲解。卡特福德有一个重要观点, 他认为, 翻译并不是把意义 (meaning) 在语言之间传来传去, 而是用译语表达的某一相似意义替换源语表达的意义。这就意味着, 再好的翻译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源语的意义。在翻译过程中, 由于译语本身词汇、语法、语义系统的限制, 总有某些意义进入不了译文或译文中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某些意义。卡特福德的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Sapir-Whorf hypothesis) 或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的启发。卡特福德的主要问题是, 他对“篇章对等”没有给出一个严谨的定义。

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 (dynamic equivalence) 的理论。该理论不像以往翻译理论那样关注所传达的信息的形式 (the form of the message), 而是着眼于译文读者的反应 (the response of the receptor)。奈达 (Nida 1969: 12) 宣布, “翻译就是用译语重新产出与源语所传达的信息最接近的自然对等信息, 对等首先是意义上的, 其次是风格上的。”单纯这样一个宣言并不会引发后来的种种争议, 问题出在奈达根据这一宣言提出的几个口号, 如“译者必须求得对等而不是同一 (identity, 指‘语义上的同一性’)”、“最好的译文听起来不像译文”、“认真的译者会想求得最接

近的自然对等 (natural equivalent)”以及“为了有效地交流,必须尊重每一种语言的特质 (genius, 指‘译语的习惯表达方式’)”等。在上述口号下,为了让读者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圣经》,奈达在《圣经》翻译中对原文做了一些手术,包括增加冗余信息、调整句子顺序、把亲吻换成热烈握手、把心换成肝等。这种做法换在别处也许稀松平常,可是奈达拿“圣”经动刀子,在某些人看来,无异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于是引发了一场围绕文化翻译问题的大争论。

福西特对于奈达的观点持一种平和、中立的态度,他反驳了对奈达的一些不公正的批评(如说他鼓吹“人种中心暴力”(ethnocentric violence)),同时也借一些批评者(如 Hu 1994: 427)之口,指出奈达理论的致命弱点是,“动态对等”建立在假定译语读者对译文有一个同一的“对等反应”基础之上,而这种“对等反应”并不存在,因为即使阅读母语作品,不同读者反应也会不同。另外,很多情况下,译者无法在译语里找到动态对等。

本章最后一个小标题是“科米萨罗夫 (Komissarov) 的清晰 (sharp) 与模糊 (fuzzy) 对等”,不过福西特没有说明这两种对等究竟是什么,仅给出科米萨罗夫提出的 5 个对等层次。

福西特总结 (p.62) 对等理论时说,人们原本期望对等理论能为正确的翻译提供科学指南,结果却证明,其理论基础并不比“直译”、“信译” (faithful translation) 和“意译” (free translation) 扎实多少。不过“对等”这一概念本身并没有错,翻译理论家对奈达动态对等理论的所有批评,都不妨碍译者在日常的翻译实践中根据自己对源语和译语读者反应的揣度(不要忘记译者本人、其家人、朋友或同事都可以是源语或译语读者),找出其认为最符合译语表达习惯的对等译法。奈达的主张是讨好普通读者的,他的口号多数是合理的、可行的。之所以说其理论基础不扎实,那是因为“读者反应”不是一个语言学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概念,奈达没有严格按照心理学或心理语言学的方法论去提出和研究问题。

六 超越词

对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这些理论没有怎么超出词和句的范畴,而翻译常常则要从篇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福西特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首先,词和句本身就是翻译的两个单位,相关的语

言学理论对翻译不能说没有价值。其次，超越词的语言学理论早已有了长足的进展，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就是介绍这方面的进展。

在句法这一层次上，福西特首先介绍了生成语法的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概念及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核心句是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一种语言里根据短语结构规则（phrase structure rules）生成的、以简单（simple）、主动（active）、肯定（affirmative）、陈述（declarative）句形式呈现的、未经任何转换（transformation）的最基本的句法结构，也就是该语言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语言中各式各样的句子，也就是其表层结构（surface structure），都是在深层结构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转换（如被动转换、否定转换、移位转换、合并转换等）产生的。译者翻译句子（特别是结构复杂、难以翻译的句子）时，可以先把它分解成多个核心句，梳理清各核心句之间的关系后，再着手翻译。福西特对核心句翻译法的评判是，对于翻译训练来说，它可能有些用处，真正进入翻译实践，其用处十分有限。

七 超越句子：语境与语域

翻译的前提是理解，理解必须依靠语境。语境的英文是 *context*，狭义的 *context* 指“上下文”，广义的 *context* 既指“上下文”，又指言语发生的情境。现在，语言学界经常用上下文本（co-text）指狭义的 *context*，用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指“言语发生的情境”，而把广义的 *context* 译成语境。

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语域（register）问题，也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的问题。说话人（或语言使用者）是一个变量，说话的情况（或语言的使用）是另一个变量，这两个变量之下又分数个次变量，任何一个变量或次变量的改变都会导致所说的话的变化，形成某一语言变体，也就是某一语体或风格。问题是，面对这些变量造成的语体或风格，译者应该怎么办？

首先，语言使用者生活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里，不同时间产生不同时代的语言，不同空间产生不同的地域方言，不同社会地位产生不同的社会方言。对于古代的语言，尽管有译者采用仿古语言译过一些名著，福西特却不主张这样做，除非源语作者有意识地在其作品中对对比性地使用了某一种古代语言。遇见这种情况，可以设法让读者感觉到两种不同时代语言的某些不同。至于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问题，福西特把